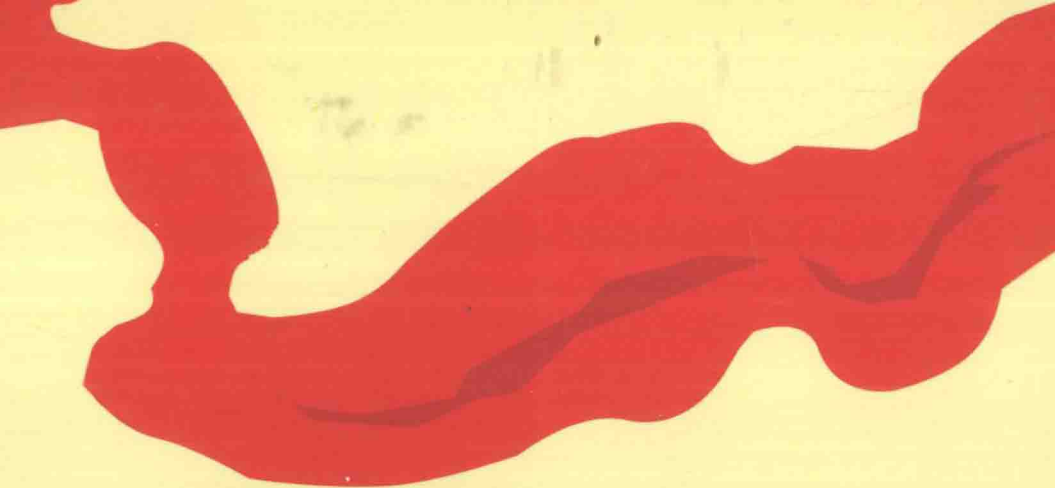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文化生态和合论

李长泰 著

MAKES I ZHUYI ZHONGGUOHUA
DEWENHUASHENGTAI HEHE
LUN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文化生态和合论

李长泰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生态和合论/李长泰著.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487-0124-8

I. 马... II. 李... III. 马克思主义 - 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307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生态和合论

李长泰 著

☐责任编辑 孙如枫

☐责任印制 文桂武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876770

传真:0731-88710482

☐印 装 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213 千字 插页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7-0124-8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序 言

赵馥洁

自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学人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历史变迁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迄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仍然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然而，以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多以社会现实为观照点，较少深入到哲学文化的层面进行剖析，因而显得现实性突出而学术性薄弱，政治强度充分而文化深度不足。当此之际，我欣喜地看到了李长泰博士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生态和合论》一书。

该书以文化哲学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做了全面深入地分析，特色十分鲜明。

首先，主线突出。全书以文化为红线贯穿始终，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障碍，文化碰撞的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条件，核心话题的转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契机，理想与现实和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转换，志同道合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共同体，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想，和合文化与玄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生态。突出而贯通的文化主线，使全书的内容结构遵循一以贯之的思路而形成了有机的理论系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围绕文化轴心而得到了新的阐释。

其次，观点新颖。由于确定了新的视角，因而作者有许多新的发现和见解，提出一系列独到的新观点。例如，它认为核心话题的转向推动了思维的转换，推动了文化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适应了核心话题转换的需要，是核心话题转换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一个不断适应核心话题不断转换需要的过程，概括言之，它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现代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思维转换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四代领导集体的思维品格适应了时代话题需要的转换，政策的变化与改革适应了核心话题转换的需要。又如它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最终是一个文化和合的问题，文化和合是一个逻辑推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解决必须分层，三个层次分别是：生存与生活层次、价值与文化层次、可能与玄理层次。基于这种分层推进与逻辑发展，思维的最后目的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未来文化生态的和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浅入深，从物质、社会向精神不断演进的过程，最后实现精神安顿，而这种安顿必须实现文化和合。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向这一目标奋斗。纵观全书，这种颇有新见的观点，不胜枚举。更可贵者，不但观点富有创新性，而且论证具有系统性。

再次，方法独特。该书主线一贯，但方法多维。全书运用了文化生态观的方法、哲学和合观的方法、逻辑历史观的方法，哲学和合观是形而上之道，文化生态观是整体方法，逻辑历史是现实方法，三种研究方法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文化生态观是视角向度，和合哲学观是综合统括，逻辑历史观是演进分析，三种方法互相包含，共容互进。由于作者自觉地将三种方法融会贯通，从而使其见解别开生面，使其论述别具一格。

此外，此书的章节建构方式和文字表达风格，也有其鲜明的个性。

李长泰同志曾在西北政法大学跟随我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硕

士学位，后又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张立文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作为引进人才从教于湖南农业大学，现任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长泰同志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学科基础，形成了较全面的知识结构，加之他勤于读书，乐于思考，学术执着，学风笃实；视野开阔而不失精细，思想活跃而时有新见，能为学界贡献出这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专著自在情理之中。书成之后，长泰同志嘱我作序，我既乐观其书之成，又欲遥寄期望之忱。故于“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深秋之日，写了上面一些话，聊为之序。

庚寅年深秋于西北政法大学静致斋

目 录

绪论 致思于文化生态和合	(1)
1. 问题的缘起：相异为二事物	(5)
2. 问题的中心：与文化相契合	(8)
3. 解决的路径：天下殊途同归	(15)
4. 方法与内容：文化生态和合	(17)
第一章 话语障碍：中西文化的差异	(22)
第一节 内容迥异：哲学理性与社会伦理	(22)
1. 智者之旅：哲学与伦理	(23)
2. 思维方式：理性与感悟	(30)
3. 学科方向：科学与社会	(33)
第二节 致思趋向：理想精神与现实社会	(37)
1. 西方重理想	(37)
2. 中国重现实	(41)
3. 海洋与田园	(44)
第三节 认识方式：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	(47)
1. 西方主客二分	(47)
2. 中国天人合一	(49)
本章小结	(51)
第二章 现实条件：文化碰撞的抉择	(52)
第一节 千年屈辱：帝国衰落	(52)
1. 思想桎梏	(53)

2. 科技落后	(56)
3. 国门大开	(58)
第二节 文化选择：中西之争	(60)
1. 西学东渐	(61)
2. 道器体用	(63)
第三节 生死抉择：自强不息	(66)
1. 生存矛盾	(67)
2. 精神动力	(70)
3. 文化根基	(74)
本章小结	(77)
第三章 文化契机：核心话题的转向	(79)
第一节 话题转向历程：文化日新	(80)
1. 核心话题转向传统：多元和合	(80)
2. 核心话题转向特征：日新盛德	(82)
3. 国家民族发展标志：文化转向	(85)
第二节 五四时代话题：文化转向	(88)
1. 内忧外患	(88)
2. 思想革新	(90)
3. 转向契机	(92)
第三节 人文语境转移：科学民主	(96)
1. 核心话题：新型文化	(97)
2. 人文语境：西方文化	(98)
3. 语境转移：马克思主义	(101)
本章小结	(104)
第四章 理念转换：理想与现实和合	(105)
第一节 理想主义	(106)
1. 英雄时世	(106)

2. 主观愿望	(112)
第二节 现实主义	(115)
1. 生存内因	(115)
2. 发展至理	(117)
3. 阵营变化	(120)
第三节 现代主义	(123)
1. 经济全球化	(123)
2. 国家现代化	(126)
3. 民族大复兴	(130)
第四节 人本主义	(134)
1. 经济振兴	(135)
2. 民生是本	(138)
3. 内外矛盾	(140)
本章小结	(145)
第五章 文化共同体：志同道合的理念	(146)
第一节 基本理念：道同为谋	(147)
1. 社会正义	(148)
2. 政治取向	(152)
3. 人民安居	(156)
第二节 致思趋向：现实问题	(160)
1. 以民为本	(160)
2. 实践观点	(164)
3. 物质生产	(168)
第三节 话语方式：大众语言	(172)
1. 民众话语	(173)
2. 辩证思维	(177)
3. 现象本质	(179)
本章小结	(183)

第六章 文化理想：齐家治国平天下	(185)
第一节 个人国家：大众文化	(186)
1. 自由民主	(186)
2. 行为礼义	(191)
3. 大众文化	(195)
第二节 家庭社会：文化社会	(199)
1. 消灭阶级差别	(199)
2. 人文化成天下	(202)
3. 社会先进文化	(206)
第三节 天下大同：文化理想	(209)
1. 和谐共处	(210)
2. 天地人和	(213)
3. 天下大同	(218)
本章小结	(224)
第七章 文化生态：文化和合与玄理	(225)
第一节 生存与生活：境象、世事、历史	(227)
1. 境象与生存	(228)
2. 世事与利益	(232)
3. 现实与历史	(236)
第二节 价值与文化：社会、价值、文化	(241)
1. 社会与能势	(241)
2. 价值与生态	(245)
3. 普世与文化	(249)
第三节 可能与玄理：精神、境界、艺术	(253)
1. 可能与精神	(254)
2. 虚灵与境界	(258)
3. 艺术与玄理	(262)

本章小结	(266)
参考文献	(268)
后记	(273)

绪论 致思于文化生态和合

时代大潮进入 21 世纪又十年,科技进步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社会分化组合的时间、空间不断收缩,文化发展不断突破旧有思维方式,出现新的文化现象。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迅速膨胀,社会意识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人们的精神动态在财富的膨胀与科技的加速度发展中难以捉摸,好像一切都在飘忽之间出现,又好像一切又都在闪电之间消散,一些新的词汇改变了原有的表达方式,新语境造就新语式,这些新语式正在慢慢调节人的心理与精神。例如,“闪”字已经成为社会表达的流行语汇,“闪族”“闪婚”等新语式词汇层出不穷,说明时代在加速变化,更新速度都在“闪”忽之间。一些人对社会的变化感到不适应,寂寞、恐惧、无望的情绪充塞着人们的精神状态,高压负荷、神经紧张已经是时代凸显的精神现象。同时,世界并不太平,不“和”的因素很多,大国竞争加剧,经济或文化差异导致的地区性冲突、局部战争依然困扰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了保持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各国都以经济为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与出发点,同时追求综合国力的提升,以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少数强国甚至以强权、霸权的方式统摄国际事务。

科技发展仍然是世界发展的主导方式与核心力量。国家发展,科技先行,科技实力是提升国家在世界中地位的主导方式;社会进步,科技先行,社会财富的增长依赖于先进的生产方式,即科技生产的进步;个体发展,科技先行,知识经济是个体发展的主导经济增长方式。知识就是力量,人才成为科技发展的先

导,尤其以科技知识的拥有与运用作为实力增长的主要方式。

然而,科技并不是万能的,主导方式并非就是唯一的。世界多极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种潮流与趋势,思想多元化是社会意识发展的一种导向,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是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的必然结果。科技发展了,但不能完全主导世界文明发展的多元导向。科技冲击了文化,文化融合了科技,但科技不能等同于文化,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冲突,因为文化是社会意识的体现,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现代科技的兴起源于西方,但西方科技并不能使世界其他地方普遍接受“西方化”,即价值观念的“普世化”,也就是说西方不可能以科技工具理性推动价值理性的一元化,东方人不可能将西方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伦理”。^①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说:“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②意思是科技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文化的趋同性,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质,它不能与科技等物质实体形态一样直接拿来与镶嵌,愈是用力拿来与嵌入,愈是起反作用,因为物极必反的缘故,这种力的反作用反而会加强自身文化的认同。

世界正在日新月异,科技并非万能;人心微妙,文化并非一元独存,调适难上加难。从空间和时间来看,文化也并非一元独存,世界正在日新月异,人的心理调适也愈加困难,一是空间变换无法预知,事物发展何去何从?东边日出西边雨。二是时间变

^① 参见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5页。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70~71页。

换应接不暇,价值判断孰是孰非?过眼云烟,飘忽即逝。科技更新突变,新的文化形态也在隐现之中点缀、装饰着世界,给社会带来一些新鲜的活力。但是,这些新形式的文化形态一时还不能成为主导社会的文化形态,更不能成为意识形态,其原因在于其飘忽即逝的特点不能主导社会人的心理因素,因为主导社会心理因素的文化形式需要具备较稳定的时效性特点,短暂的文化形式难以形成稳定的文化基垫,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因此,文化认同,还得以历史的沉积、时空的磨合、经验的总结作为基础条件,我们称之“和合”。新文化的出现对原有意识形态造成冲击,人的心灵暂时有一种接受新文化的趋向性,但这种趋向性并非是非稳固性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思考,说不定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然后经过多次这种经历,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种价值成为主导自身文化心理导向。因此,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文化形式新潮涌现,人心理文化因素却是稳中有变,自身心理也在科技的更新中不断加强自身文化认同或者文化趋同。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世界科技突飞猛进、新文化形式不断出现流逝又不断再生,中国人与先辈一样,同样面临科技与价值观念、科技与文化、民族与世界的心理调适。首先,中国人民选择了国家发展、科技先行。中国需要世界,中国突起需要科技,中国的发展前进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不能脱离世界潮流,国家发展、科技先行。其次,中国人民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品格。中国发展强大借助了西方发展的科技工具理性,但在发展方式上选择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中国模式,价值理性的独特性得到彰显,中国没有因为工具理性而出卖价值理性,相反中国将工具理性很好地与价值理性相与为一,使科技为价值观念服务,保持了自身文化品格的独立,“中国特色”的语词就是国家价值理性与国家工具理性相结合的产物。近百年的亚洲发展表明,凡是崛起为

强大的国家大都采用了利用西方的科技促进发展而文化品格保持了独立性，利用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例如，19世纪日本的“脱亚入欧”思维体系促成日本的强大，但“脱亚入欧”并没有使日本丧失民族文化品格，相反使日本迅速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虽然与日本“脱亚入欧”发展模式迥异，但思维方法上有相一致之处，即以民族的独立、文化自身认同为出发点的，只是日本的“西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正是由于日本的“西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使日本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安全危机，日本近十几年发展停滞不前，其原因之一就是过于“西化”，在发展模式上依赖，甚至屈从于西方。以此为鉴，以历史的视角与哲学的视角视之，我们不得不说，成也“脱亚入欧”，滞也“脱亚入欧”。世界如何看亚洲？近代以来要看日本，近代日本在亚洲迅速称雄。世界如何看亚洲？在当代要看中国，当代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在日本之后，但中国的成功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力却远远大于日本对世界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其二，中国崛起的模式是中国自身模式，而不是类同于日本的“脱亚入欧”。

正因为是“中国模式”，而不是“西方模式”，也非“日本模式”，其影响力使中国在世界成功扮演了一个让世界难以理解的形象，这个形象既让人吃惊，又让人难以捉摸。正是基于此，中国模式“软实力”的影响力空前提升，有人将此成功归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又有人将此成功归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力，更有人将此成功归于中国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后续影响力，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观之，中国近几十年的成功不是单方面的原因所致，而是经济、文化、政治、历史等综合因素所致。从治国理念上说，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念的成功运用可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也可归功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而这一运用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 问题的缘起：相异为二事物

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语词已是路人皆知、家喻户晓，马克思主义的确在中国确立了她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占据了现代中国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大众化，民众的话语系统充塞着马克思主义的语词，足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这—是由于执政党的意识强化使马克思主义在民众思想中具有较稳定统治地位，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被广大民众普遍采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既被中央领导层视为主导思想与工作方法，又被普通民众视为基本常识与基本方法。

然而，随着科技的瞬息更新、世界形势的快速变化，人们的思维不断发生变换，人们不断运用新思路、新方法，不断创造新思维、运用新思维，民众的语言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语词已经明显少于往日，其原因—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导致中国有—多元思想的并存，至少是中国传统思想、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三元并存，多元思想并存必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地位，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八九十年，人们已经对其存在习以为常，久而久之，对其思想缺乏激情与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有相对明显的弱化趋势。但在人们日常生活、思维方式、处世方法中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的确运用得很多，只不过没有意识并将其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以说，马克思在中国的实践中实现了大众化，马克思主义还在不断地实现中国化，并且将—直处于这—“中国化”的过程之中，这—过程会—直进行下去，永远“在途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已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流行语词，“中国化”话语流行于学术界、政界，成为学术研究、政府

决策的流行词,“中国化”一词彰显了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处事方法,“中国化”成为诠释中国过去、现在的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话语。特别是在中西冲突与矛盾之中,这一话语成为中国人赢得民族独立与自尊、争取国家崛起与自强的有力证据,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哲学思维上都能以“中国化”作为一个有力诠释证据。事实表明“中国化”是处理中西关系中的关键话语,并且是成功的,中国古代对佛教进行了中国化,中国近代以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化,还有现代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与使用,也进行了对西方科技的中国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一巨大成功带动了“中国化”话语成为诠释中西关系中现实、未来的关键语词,并且有可能加以放大。

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能真正实现中国化?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一般而论,“化”字的真实内涵是融为一体,无论是在成分、机理、机制等方面都是合一的,实现“化”字何其难。其中,问题的缘起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与“中国的”是相异的二事物,相异的二事物何以能实现前者的中国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与“中国的”存在的地域界限明显相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地域上说从属于西方的思想,具体说来从属于欧洲思想,在分系上虽与西方整体思想有些不同,但从地理上看,属于西方思想的一部分确信无疑。传统思想划分上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划分为西方思想,其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整体西方思想在本质上有明显的思维方式区别与阶级区别,因此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归入西方思想范畴。但是,相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也是西方的,无论从话语方式、思维方式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异其趣,东西方的不同是自古以来中西交流中形成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首先不是“中国的”,二者有地域上的区别,西方的事物在东方中国传播、生根、发展,存在